

楊松年著

文史哲學集成

中國文學批評論集
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# 中國文學批評論集

## 目 次

一、葉燮詩論的重變精神：《原詩》「內外篇」論析	一
二、林昌彝《射鷹樓詩話》的射鷹思想	七一
三、「韓愈以文爲詩說」析評	一〇七
四、起承轉合：中國詩論者論詩法	一三三
五、江山之助：中國詩文論者論山水閱歷與文學創作之關係	一六七
後 記	一八七
楊松年博士簡介	一八九

# 葉燮詩論的重變精神

## ——《原詩》「內外篇」論析

葉燮，江蘇吳縣人。字星期，號已畦。寓居橫山，人稱橫山先生。生於明熹宗天啓七年（一六二七），卒於清聖祖康熙四十二年（一七〇三），享年七十七。康熙九年（一六七〇）進士，十四年（一六〇五）知揚州寶應縣，以忤長官被參落職。（註一）著有《已畦文集》二十二卷，《詩集》一卷，《詩集殘餘》一卷，《原詩》四卷（註二），《汪文摘謬》一卷（註三），《吳江縣志》四十六卷（註四）等等（註五）。

《原詩》四卷，分內外二篇，每篇一卷，是葉氏論詩之作，寫於落職歸隱之後，原附《已畦文集》刊行。《昭代叢書》併作一卷（註六）。丁福保（一八七四——一九五二）輯《清詩話》，依《昭代叢書》作一卷收於其中（註七）。郭紹虞編《清詩話》，遂按《已畦文集》復分爲四卷（註八）。霍松林校注《原詩》，於各則編次與段落分割曾略作調動，仍分爲四卷（註九）。

### 一、葉燮詩論的重變精神

《原詩》雖被丁福保、郭紹虞等人列爲詩話，但立論之嚴謹，議論之博識，與一般中國詩話之作不同，所以《四庫全書提要》評之爲：「是作論之體，非評詩之體。」（註一〇）然而如果我們不以傳統的詩話體製的拘限來看這部作品，它在詩論之表現，是一般詩話所不能及的。所以郭紹虞譽之爲「《清詩話》中較好的著作」（註一一），蔣凡譽之爲「一部光輝的美學理論著作」（註一二）。近十多年來，中國文學評論研究界對這部著作已給予高度的重視與評價，不僅有多種專文與專書論及《原詩》（註一三），葉燮也成爲高級學位論文研究的題目（註一四）。

郭紹虞評《原詩》時說：「葉燮論詩之長，在用文學史流變的眼光與方法以批評文學，故對詩之正變與盛衰，能有極透澈的見解。」（註一五）是正確的。不過，葉燮不僅是以「流變」的眼光來看待「詩之正變與盛衰」的問題，實際上，整部《原詩》，整個葉氏的詩論，是無處不具現他的重變的精神的。環觀研究葉氏詩論的作品，或者對此點伸論不足，或者有曲解之處。這就是我之所以撰寫本文的原因。

## 二

葉燮《原詩》，用及「變」字之處不少，共有八十四次。他認爲世間上的一切事物，都是在不斷的變遷之中發生與發展的。《原詩》「內篇上」云：

蓋自有天地以來，古今世數氣數，遞變遷以相禪。古云：「天道十年一變。」此理也，此勢也，無事無物不然，……（註一六）

因此，對待任何事物，都必須持着「變」的眼光結合實際情況對待與處理。政治的措施也是如此。他說：

夫古今時會不同，卽政令尚有因時而變通之，若膠固不變，則新莽之行周禮矣。（註一七）所以絕對不能以「膠固不變」的態度來看待詩道。在言及「古今世運氣數，遞變遷以相禪」，世上「無事無物不然」之後，他就指出：

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？（註一八）

他以《三百篇》爲例表示：《三百篇》中，〈風〉有正風，有變風；〈雅〉有正雅，有變雅。〈風〉〈雅〉已經不能不由正而變，何況後代之詩；而且，即使孔子刪詩，也不能不正視變的存在而加以留存（註一九），因此，他得到結論云：

後此爲風雅之流者，其不能伸正而詛變也明矣。（註二〇）

「變」不但不能詛，人們更需要以此來看待詩的發展。他本身分析歷代詩的發展，就基於這種眼光。他說：

漢蘇、李始創爲五言，其時又有亡名氏《十九首》，皆因乎《三百篇》者也；然不可謂卽無異於《三百篇》，而實蘇、李創之也。建安、黃初之詩，因於蘇、李與《十九首》者也；然《十

九首》止自言其情，建安、黃初之詩，乃有獻酬、紀行、頌德諸體，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，則因而實為創，此變之始也。《三百篇》一變而為蘇、李，再變而為建安、黃初。建安、黃初之詩，大約敦厚而渾樸，中正而達情；一變而為晉，如陸機之纏綿鋪麗，左思之卓犖磅礴，各不同也。（註二二）

歷代詩就在因、變、創的關係下相禪變遷發展，也在這關係下形成了不同詩人的不同詩作風格。葉氏舉六朝詩人為例說：

其間屢變而為鮑照之逸俊，謝靈運之警秀，陶潛之澹遠；又如顏延之之藻績，謝朓之高華，江淹之韶嫵，庾信之清新；此數子者，各不相師，咸矯然自成一家，不肯沿襲前人以為依傍，蓋自六朝而已然矣。（註二三）

葉變也指出：詩的發展雖是相續相禪，遞變遷而演進，但其軌迹不是循環性的，而是由粗陋而精，踵事而增華。他曾舉例說：

彼虞廷喜起之歌，詩之土籃、擊壤、穴居、儼皮耳。一增華於《三百篇》，再增華於漢，又增於魏。自後盡態極妍，爭新競異，千狀萬態，差別井然。（註二三）

又說：

故不讀「明」「良」、「擊壤」之歌，不知《三百篇》之工也。不讀《三百篇》，不知漢、魏詩之工也。不讀漢、魏詩，不知六朝詩之工也。不讀六朝詩，不知唐詩之工也。不讀唐詩，不知

宋與元詩之工也。夫惟前者啓之，而後者承之而益之；前者創之，而後者因之而廣大之。使前者未有是言，則後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；前者已有是言，則後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為他言。（註二四）

並曾以植物之萌芽茁長爲例譬喻詩之發展云：

譬諸地之生木然，《三百篇》則其根，蘇、李詩則其萌芽由蘖，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，六朝詩則有枝葉，唐詩則枝葉垂蔭，宋詩則能開花，而木之能事方畢。（註二五）

以畫家之作畫譬喻歷代詩之發展云：

漢、魏之詩，如畫家之落墨於太虛中，初見形象，一幅絹素，度其長短闊狹，先定規模，而遠近濃淡，層次脫卸，俱未分明。六朝之詩，始知烘染設色，微分濃淡，而遠近層次，尚在形似意想間，猶未顯然分明也。盛唐之詩，濃淡遠近層次，方一一分明，能事大備。宋詩則能事益精，諸法變化，非濃淡遠近層次所得而該，刻畫博換，無所不極。（註二六）

以建屋喻歷代詩之演進云：

又漢、魏詩如初架屋，棟梁柱礎，門戶已具，而牕櫺檻檻等項，猶未能一一全備，但樹棟宇之形製而已。六朝詩始有牕櫺檻檻，屏蔽開闔。唐詩則於屋中設帳幙床榻器用諸物，而加丹堊雕  
刻之工。宋詩則製度益精，室中陳設，種種玩好，無所不蓄。（註二七）

所以他說：

## 一、葉燮詩論的重變精神

大凡物之踵事增華，以漸而進，以至於極。（註二八）

基於此種見解，他进而分析詩之源流關係，以《三百篇》爲詩之源，以漢魏及其以後之詩爲詩之流云：

且夫《風》《雅》有正有變，其正變係乎時，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，由隆而污，此以時言詩，時有變而詩因之，時變而失正，詩變而仍不失其正，故有盛無衰，詩之源也。吾言後代之詩，有正有變，其正變係乎詩，謂體格、聲調、命意、措辭、新故、升降之不同，此以詩言時，詩遽變而時隨之，故有漢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之互為盛衰，惟變以救正之衰，故遞衰遞盛，詩之流也。（註二九）

認爲《三百篇》中之《風》《雅》，雖有正有變，其正變決定於時，時變詩亦變，唯詩變而不失正，故有盛無衰。漢魏及其以後的詩，雖也有正有變，但其正變決定於詩本身，決定於詩本身的體格、聲調、命意、措辭、新故、升同之不同，時只是隨着詩之變化而變化，所以漢及其以後的歷代詩作互爲盛衰，而變能救正之衰，而使詩的發展遞衰遞盛。

葉燮論詩之源，強調的是時代的因素，以時決定詩，決定詩的正變，同時詩之變不影響詩之盛衰，但論及詩之流，強調的是詩本身的因素，時的變化決定於詩的變化，詩的體格、聲調、命意、措辭、新故、升降的不同，影響詩的正變，而變可救正之衰。葉氏的這兩種論詩的態度，我認爲是有矛盾存在的。這也反映葉氏詩論不能擺脫傳統影響的局限性。有關這一點，會在下一節再加說明。

就葉燮詩論整體而言，他着重的是詩本身的質素，強調變對詩的盛衰發展的作用，因為正有漸衰，而變能啟盛；亦有因正而至衰，而變能使衰致盛。他說：

歷考漢、魏以來之詩，循其源流升降，不得謂正為源而長盛，變為流而始衰；惟正有漸衰，故變能啟盛。如建安之詩，正矣盛矣，相沿久而流於衰。後之人力大者大變，力小者小變。六朝諸詩人，間能小變，而不能獨開生面。唐初沿其卑靡浮艷之習，句櫛字比，非古非律，詩之極衰也。而陋者必曰：此詩之相沿至正也。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。迨開、寶諸詩人，始一大變，彼陋者亦曰：此詩之至正也。不知實因正之至衰，變而為至盛也。（註三〇）

因此他以為：詩之發展，固由粗陋至繁華，但並不等於說，在前者必劣，在後者必優，在後者必劣。他曾以建屋比喩此理云：

大抵屋宇初建，雖未備物，而規模弘敞，大則宮殿，小亦廳堂也。遞次而降，雖無製不全，無物不具，然規模或如曲房奧室，極足賞心；而冠冕闊大，遜於廣夏矣。夫豈前後人之必相遠哉？（註三一）

因此，各時期詩各有盛衰，各有優劣，各有其特色，故論各代詩之工拙時云：

又嘗謂漢、魏詩不可論工拙，其工處乃在拙，其拙處乃見工，當以觀商、周尊彝之法觀之。六朝之詩，工居十六七，拙居十三四，工處見長，拙處見短。唐詩諸大家、名家，始可言工；若拙者則完全拙，不堪寓目。宋詩在工拙之外，其工處固有意求工，拙處亦有意為拙，若以工拙

上下之，宋人不受也。此古今詩工拙之分劑也。（註三二）

### 論初、盛、中、晚四唐詩之特色云：

論者謂晚唐之詩，其音衰颯，然衰颯之論，晚唐不辭；若以衰颯為貶，晚唐不受也。夫天有四時，四時有春秋，春氣滋生，秋氣肅殺，滋生則敷榮，肅殺則衰颯，氣之候不同，非氣有優劣也。使氣有優劣，春與秋亦有優劣乎？故衰颯以為氣，秋氣也。衰颯以為聲，商聲也。俱天地之出於自然者，不可以為貶也。又盛唐之詩，春花也。桃李之纓華，牡丹芍藥之妍艷，其品華美貴重，略無寒瘦儉薄之態，固足美也。晚唐之詩，秋花也。江上之芙蓉，籬邊之叢菊，極幽艷晚香之韻，可不為美乎？（註三三）

所以他談詩之溫厚敦厚，亦與其他論者不同：

或曰：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漢、魏去古未遠，此意猶存，後此者不及也。」不知溫柔敦厚，其意也，所以為體也，措之於用則不同；辭者，其文也，所以為用也，返之於體則不異。漢、魏之辭，有漢、魏之溫柔敦厚；唐、宋、元之辭，有唐、宋、元之溫柔敦厚。譬之一草一木，無不得天地之陽春以發生，草木以億萬計，其發生之情狀，亦以億萬計，而未嘗有相同一定之形，無不盡然皆具陽春之意，豈得曰：若者得天地之陽春，而若者為不得者哉？且溫柔敦厚之旨，亦在作者神而明之，如必執而泥之，則「巷伯」「投畀」之章，亦難合於斯言矣。（註三四）由「溫柔敦厚之旨，亦在作者神而明之」一語，可知葉燮是極為重視詩人之表現的，他在討論詩風的

變化上，亦本此觀點。他認為詩風能由衰轉盛，全繫於詩人之是否能變，雖然亦有因變而盛衰者。「力大者大變，力小者小變」（註三五），亦因詩人之質素而異，亦有「或一人獨自爲變，或數人而共爲變」（註三六）。在批評歷代詩人時，他就以此爲標準申論。如言及南北朝迄元明之詩人云：

歷梁、陳、隋以迄唐之垂拱，踵其習（指前代之繁華縟節）而益甚，勢不能不變。小變於沈、宋、雲龍之間，而大變於開元、天寶，高、岑、王、孟。此數人者，雖各有所因，而實一一能爲創。而集大成如杜甫，傑出如韓愈，專家如柳宗元，如劉禹錫，如李賀，如李商隱，如杜牧，如陸龜蒙諸子，一一皆特立興起，其他弱者，則因循世運，隨乎波流，不能振拔，所謂唐人本色也。宋詩襲唐人之舊，如徐鉉、王禹偁輩，純是唐音。蘇舜欽、梅堯臣出，始一大變，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。自後諸大家迭興，所造各有至極，今人一槩稱爲宋詩者也。自是南宋、金、元作者不一，大家如陸游、范成大、元好問爲最，各能自見其才。有明之初，高啓爲冠，兼唐、宋、元人之長，初不於唐、宋、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。（註三七）

而在各代芸芸詩人之中，特別推崇杜甫、韓愈、蘇軾。推崇杜甫，不僅在他能大變前代詩風，亦在其詩能包源流、綜正變、影響後代至鉅。其言云：

杜甫之詩，包源流，綜正變，自甫以前，如漢、魏之渾樸古雅，六朝之藻麗縷纖，澹遠韶秀，甫詩無一不備，然出於甫，皆甫之詩，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。自甫以後，在唐如韓愈、李賀之奇崛，劉禹錫、杜牧之雄傑，劉長卿之流利，溫庭筠、李商隱之輕艷，以至宋、金、元、明

之詩家，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，各自炫奇翻異，而甫無一不為之開先。此其巧無不到，力無不舉，長盛於千古，不能衰，不可衰者也。（註三八）

稱譽韓愈、蘇軾則在他們能大變詩風，使詩道由衰轉盛。其言云：

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，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。其力大，其思雄，崛起特為鼻祖。宋之蘇、梅、歐、蘇、王、黃，皆愈為之發其端，可謂極盛。……開、寶之詩，一時非不盛，遞至大曆、貞元、元和之間，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，此百餘年之詩，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，不傳者更可知矣。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，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。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，想其時陳言之為禍，必有出於目不忍見，耳不堪聞者，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，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，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，可不力乎？……至於宋人之心乎，日益以啓，縱橫鉤致，發揮無餘蘊，非故好為穿鑿也。譬之石中有寶，不穿之鑿之，則寶不出；且未穿未鑿以前，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，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。如蘇軾之詩，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，天地萬物，嬉笑怒罵，無不鼓舞於筆端，而適如意之所欲出，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。（註三九）

而在三人之中，尤極讚杜甫，甚而以他比之孔子，稱之為詩之神，原因就在於他的詩作不但善於變化，而且變化又不失其正。葉氏云：

變化而不失其正，千古詩人，惟杜甫為能。高、岑、王、孟諸子，設色止矣，皆未可語以變化也。夫作詩者，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。此猶清任和三子之聖，各極其至，而集大成，聖而不可

知之之謂神，惟夫子。杜甫，詩之神者也，夫惟神乃能變化。（註四〇）

於具體評析杜詩時，就本於其變論其成就，如云：

杜甫七言長篇，變化神妙，極慘淡經營之奇。（註四一）

又如：

至如杜之《哀王孫》，終篇一韻，變化波瀾，層層掉換，竟似逐段換韻者，七古能事，至斯已極，非學者所易步趨耳。（註四二）

而對詩人之不能變，或變之太過者，也有不滿之辭，如評鮑照、庾信詩云：

六朝諸名家，各有一長，俱非全璧。鮑照、庾信之詩，杜甫以清新、俊逸歸之，似能出乎類者。究之拘方以內，畫於習氣，而不能變通；然漸闢唐人之戶牖，而啓其手眼，不可謂庾不為之先也。（註四三）

又評梅堯臣、蘇舜欽詩云：

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，始於梅堯臣，蘇舜欽二人。自漢、魏至晚唐，詩雖遽變，皆遽留不盡之意，即晚唐猶存餘地，讀罷掩卷，猶令人屬思久之。自梅、蘇變盡崑體，獨創生新，必辭盡於言，言盡於意，發揮鋪寫，曲折層累以赴之，竭盡乃止。才人伎倆，騰踔六合之內，縱其所如，無不可者；然含蓄渟泓之意，亦少衰矣。歐陽修極伏膺二子之詩，然歐詩頗異於是。以二子視歐陽，其有狂與狷之分乎？（註四四）

評學李賀詩云：

李賀鬼才，其造語入險，正如倉頡造字，可使鬼夜哭。王世貞曰：「長吉師心，故爾作怪，有出人意表；然奇過則凡，老過則稚，所謂不可無一，不可有二。」余嘗謂世貞評詩，有極切當者，非同時諸家可比。「奇過則凡」一語，尤為學李賀者下一痛砭也。（註四五）

葉氏又以為：萬物變化多端，但可以理事情三字概括。他說：

曰理、曰事、曰情，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。凡形形色色、音聲狀貌，舉不能越乎此，此舉在物者而為言，而無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。（註四六）

他曾具體說明理、事、情之含義云：

曰理、曰事、曰情三語，大而乾坤以之定位，日月以之運行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：三者缺一，則不成物。文章者，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；然具是三者，又有總而持之，條而貫之者，曰氣。事、理、情之所為用，氣為之用也。譬之一草一木，其能發生者，理也。其既發生，則事也。既發生之後，天喬滋植，情狀萬千，咸有自得之趣，則情也。苟無氣以行之，能若是乎？（註四七）

可知葉氏所謂理，為萬物發生的道理；事為萬物發生發展之事實，而情為萬物發生發展所呈現之情形，氣是使萬物得以生動靈現之質素。萬物可以無「氣」，但不能離卻「理」、「事」與「情」。針對這點，葉氏曾作以下的說明：

草木氣斷則立萎，理、事、情俱隨之而盡，固也。雖然，氣斷則氣無矣，而理、事、情依然在也。何也？草木氣斷則立萎，是理也。萎則成枯木，其事也。枯木豈無形狀，向背、高低、上下？則其情也。由是言之，氣有時而或離，理、事、情無之而不在。（註四八）

萬物是如此，詩文之道亦然，亦可以理、事、情概括之。葉氏云：

自開闢以來，天地之大，古今之變，萬象之蹟，日星河嶽，賦物象形，兵刑禮樂，飲食男女，於以發為文章，形為詩賦，其道萬千，余得以三語蔽之，曰理、曰事、曰情，不出乎此而已。

（註四九）

因此詩之寫作，只要揆之於理、事、情而不背，則可，非在理、事、情定立一法而嚴加遵守。他說：然則詩文一道，豈有定法哉？先揆乎其理，揆之於理而不謬，則理得。次徵諸事，徵之於事而不悖，則事得。終絜諸情，絜之於情而可通，則情得。三者得而不可易，則自然之法立。故法者當乎理，確乎事，酌乎情，為三者之平準，而無所自為法也。（註五〇）

葉氏又表示：「作者之匠心變化，不可言也。」惟有通乎理、事、情，才能令胸中通達無阻，而使文辭暢順地表達。他說：

（理、事、情）三者得，則胸中通達無阻，出而敷為辭，則夫之所云辭達。達者通也，通乎理，通乎事，通乎情之謂。（註五一）

然而，理有不可名言之理、事有不可施見之事，情有不可徑達之情，這才是詩人致力之處，是使詩超

脫世俗之作的關鍵。葉燮於答人問詩之寄託在可言不可言之間，詩之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時說：子但知可言、可執之理之為理，而抑知名言所絕之理之為至理乎？子但知有是事之為事，而抑知無是事之為凡事之所出乎？可言之理，人人能言之，又安在詩人之言之？可微之事，人人能述之，又安在詩人之述之？必有不可言之理，不可述之事，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，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。（註五二）

並曾舉四個杜詩句爲例。深入地分析以上的看法，如析《玄元皇帝廟》「碧瓦初寒外」一句云：

言乎外，與內爲界也，初寒何物，可以內外界乎？將碧瓦之外，無初寒乎？寒者，天地之氣也，是氣也，盡宇宙之內，無處不充塞，而碧瓦獨居其外，寒氣獨盤踞於碧瓦之內乎？寒而曰初，將嚴寒或不如是乎？初寒無象無形，碧瓦有物有質，合虛實而分內外，吾不知其寫碧瓦乎？寫初寒乎？寫近乎乎？寫遠乎？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，雖稷下談天之辨，恐至此亦窮矣。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，覺此五字之情景，恍如天造地設，呈於象，感於目，會於心。意中之言，而口不能言；口能言之，而意又不可解。劃然示我以默會相象之表，竟若有內有外，有寒有初寒，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。有中間，有邊際，虛實相成，有無互立，取之當前而自得，其理昭然，其事的然也。……天下惟理、事之入神境者，固非庸凡人可摹擬而得也。（註五三）

所以他說：

作詩者，實寫理、事、情，可以言言，可以解解，即為俗儒之作。惟不可名言之理，不可施見之事，不可徑達之情，則幽渺以為理，想像以為事，惝恍以為情，才為理至、事至、情至之語。（註五四）

而這一切，必先有胸襟以爲基。葉氏云：

我謂作詩者，亦必先有詩之基焉。詩之基，其人之胸襟是也。有胸襟，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，聰明才辨以出，隨遇發生，隨生卽感。（註五五）

杜甫之所以能成爲偉大的詩人，就在於他的詩有胸襟以爲基。他說：

千古詩人推杜甫，其詩隨所遇之人、之境、之事、之物，無處不發其思君王、憂禍亂、悲時日、念友朋、弔古人、懷遠道，凡歡愉、幽愁、離合、今昔之感，一一觸類而起，因遇得題，因題達情，因情敷句，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爲基。如星宿之海，萬源從出，如鑽燧之火，無處不發；如肥土沃壤，時雨一過，天喬百物，隨類而興，生意各別，而無不具足。（註五六）

亦盛讚陶潛之胸次：

陶潛胸次浩然，吐棄人間一切，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，詩家之方外，別有三昧也。遊方以內者，不可學，學之猶章甫而適越也。唐人學之者，如儲光羲，如韋應物；韋旣不如陶，儲雖在韋前，又不如韋。總之，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。（註五七）

也稱讚詩人之品量者：